

编者按：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目前国内已有近13个省市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计划清单，共包括逾10000个项目、投资总额近34万亿，其中5G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重。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的范围，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这三方面。进入2020年以来，中央密集部署“新基建”，这一热词被频频点名。

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加大。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不可能再用过去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强力支撑。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加快部署“新基建”的重要原因。

传统基建，是俗称“铁公基”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更加注重数字化、智能化等硬核科技。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5G、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别是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稳定经济秩序、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特殊功能，一直在世界各国应对重大灾害和危机冲击的举措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是中国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外部危机影响的重要措施。尽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期推出“新基建”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解读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大规模“新基建”热潮对经济复苏的刺激作用，以及未来对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重点分析这一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方向、重点领域及其带来的行业机会。希望能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新基建

- 02 解读“新基建”热潮
- 05 34万亿“新基建”带来了什么？
- 06 34万亿新基建的新机会
- 08 “新基建”助力抗疫情稳增长正当其时

全球大观

- 09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经济纵横

- 13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

文化漫步

- 17 中日文学交往中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悦读时光

- 封三 五一假期怎么游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0年4月28日

印 数：4600-4800

解读“新基建”热潮

随着各地本土新增确诊病例降为0例，中国目前的防疫重点转为防境外输入病例，经济发展正在全力复苏。事实上，从2月中下旬开始，各地就开始“两手抓”：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让经济恢复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发布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目前国内已有近13个省市发布了

2020年重点项目计划清单，共包括逾10000个项目、投资总额近34万亿。

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中，基建仍是重头戏，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下称“新基建”）开始崭露头角，如大部分省份均提到了有关5G等新基建的规划，一时间，这波巨额投资计划被解读为“新基建”狂潮来袭，备受资本追捧，在市场引起热议。

又是一个“4万亿”？

新基建的概念并不新，也不复杂。早在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中就已提出，加快“城际交通、物流、市

各地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清单一览表

设计 邓屈轩

21世纪经济报道 出品

省份	项目数量	总投资额	年度投资额	项目清单
北京	300个		当年计划投资252.3亿元、建安投资125.3亿	100个基础设施项目、100个民生改善项目、100个高精尖产业项目。
河北	536个	18833.1亿	2410.1亿	新开工项目投资4436.2亿元，续建投资4422.6亿元，保投产项目投资3327.5亿元，前期项目投资6646.8亿元。
山西	248个			建设项目170项，前期项目78项。
上海	212个			正式项目152项(其中科技产业类42项、社会民生类25项、生态文明类12项、城市基础设施类57项、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16项)，预备项目60项。
黑龙江	300个	8856亿	2000亿	300个“百大项目”
江苏	240个		5410亿	创新载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87亿元，产业项目投资1851亿元，生态环保项目投资301亿元，民生项目投资958亿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2212亿元。

福建	1567个	3.84万亿		在建项目1257个，总投资2.97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005亿元；预备项目310个，总投资0.87万亿元。
山东	321个			233个重大建设项目，88个重大预备项目。
河南	980个	3.3万亿		涵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和社会事业六大领域。
云南	525个	约5万亿	约4400亿	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约3.6万亿元。
四川	700个	约4.4万亿	6000亿以上	“补短板、增动力”省级重点前期项目，共有3373个，总投资约8万亿元。
重庆	924个	约2.7万亿	约3400亿	续建项目484个，计划新开工项目216个。
宁夏	80个	约2268亿	约510亿	分为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产业、民生、区域协调发展五大领域。
合计	10326个	33.83万亿	2.79万亿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政基础设施，以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入2020年，新基建被提及的更加频繁，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中央会议上，曾3次提到“新基建”的相关内容，值得一提的是，3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首次提及“数据中心”。

根据央视的表述，“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包含7大类：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不难看出，最早关于新基建的表述中，并没有“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这三项内容，事实上，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早已建设多年，将它们纳入新基建“实在有点勉强”。所以，业内一般将这三项内容称为类新基建，其他4项为狭义的新基建。从各地投资计划的表述来看，上述7大领域的“新基建”大体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传统基建补短板，如类新基建；一个是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信息技术或网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新基建的“新意”所在，强调技术属性及其应用领域。

也正因为如此，在疫情之下，市场对新基建的技术效应寄予厚望，甚至引发猜测，此轮“新基建狂潮”会是2008年4万亿刺激的翻版？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此轮约50万亿元的投资是各地涵盖多年的投资计划总额，其中，已公布省份2020年计划投资总额合计不到10万亿元。事实上，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到60万亿元，2019年的基建投资也达到17万亿元，这些都是不小的数额。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有11个省份的2020年重点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甚至比2019年下降了1%，这些都说明，今年的计划投资总额大小并不足为奇，因为各地每年都会争相发布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背后有未来争取中央项目和相关资金支持的考量。

其次，这笔巨额资金只是计划投资金额，并非实际投资金额，也不会全部用于基建投资，投入新基建的投资更少。据国泰君安研报，在政府基建投资中，尚未有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统计，但可以从PPP库细分项目中窥见一斑。目前存量PPP项目总投资规模大概17.6万亿元，其中，传统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约7.1万亿元，约占41%。而狭义新基建项目在17多万亿PPP项目库中，不足1000亿元，占比只有0.5%，即便加上类新基建项目的2.6万亿，央视版“新基建”的投资规模也只有PPP项目库的15%左右，

约为传统基建的四成。

此外，这次疫情并非完全针对疫情，在春节前，四川、重庆、陕西和河北等省份已经发布了本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新基建的概念也在2018年年底就已经提出，与2008年4万亿被动应对经济危机的非常规举措相比，此次新基建潮更像是一种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规划。7大领域的“新基建”大体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传统基建补短板，如类新基建；一个是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信息技术或网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能否稳增长？

很显然，这次“新基建”潮不会是当年4万亿刺激，有着数字技术基因的“新基建”能否承担稳增长的大任，也有待检验。还是先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说起。受疫情影响，出口和消费冲击较大，稳增长更多的期待靠投资发力。

如果按支出计算法来统计GDP，投资部分叫“资本形成总额”，“资本形成总额”中大部分来自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有三大类：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不具有反周期调节能力，而房地产投资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各地放松房地产的政策只能屡次以“一日游”而落幕，如此一来，基建投资无疑再次承担了逆周期调节的重任，能否如愿呢？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9年开始，已连续下滑10年，据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而另一方面，过去这几年，随着去杠杆、资产新规等金融行业整顿带来的信用收紧，基建投资增长失去了往日丰富的资金流，增速从2017年的19%骤降到2018年的3.8%，并一直持续到2019年也无半点变化。据西南证券的测算，如果要对冲消费放缓对经济的影响，使2020年经济增速保持在5.6%以上，基建投资增速至少需要在12.4%以上。2020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4.5%，基建投资同比-30.3%，要想全年达到12.4%的增速，后续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新基建有着天然的技术和互联网属性，从长远来看，未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特别是5G技术，显然已激起全球新一轮的技术竞赛，但现实是，目前投资规模还比较小，占固定投资的比重也有限，对当下稳增长而言可谓是有心无力。以广东为例，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涉及金额约为1万亿元，占广东省计划总金额近17%，其中，涉及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的类新基建金额超过90%，而狭义新基建项目投资金额仅占1.6%。狭义的“新基建”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它们需要应用于

具体的产业发展中，才能放到技术的乘数效应，让产业转型步入快车道，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决定新基建能否发挥作用的是技术应用条件成熟度，即一系列配套措施是否到位，比如行业标准、技术研发与突破等，显然这些都不是短时间能攻克，换句话说，即使政策扶持和资金到位，新基建也不一定能在短时间拉动经济增长。

这些年来，基建投资收益低且投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风险大，企业无法成为投资主体，自然而然落到了地方政府身上，但地方政府都有经济指标考核任务，新基建又无法在短期发力，此时，地方政府难免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在具体在落实投资计划时，势必会有所衡量，这也是新基建投资规模占比小的原因之一。

说回“三驾马车”，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功效曾一度突破60%，2019年回落至57.8%，依旧远远超过其他投资和出口，如果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程度考虑，似乎刺激消费才是稳增长的关键举措。事实上，已经不少地方早已行动。3月9日，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相继出现在小吃店和书店消费、购物，接着，各地党政一把手纷纷效仿，亲自带头“下馆子”，试图引导消费。随后，消费刺激政策升级。3月13日，发改委、工信部、央行等2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19条措施。在政策推动下，全国已经有10余个省、市、特区政府向市民发放消费券，试图发挥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其中，南京发放的消费券总金额达3.18亿元，也是目前发放消费券总额最高的城市。目前，发消费券的方式能多大程度上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仍有待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国内居民杠杆率已超60%的情况下，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挤压，让刺激效果打折扣。

那到底如何稳增长？不少专家的建议是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都市圈发展阶段，2019年，中国新型城镇化率为60.60%，与国外发达国家依旧有差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今后10年，70%~80%的新经济增长动能，将集中在国内若干大都市圈内，仅都市圈发展一项，每年就可拉动经济增速0.5~1个百分点。如何继续发挥都市圈发展的积聚效应、释放都市圈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尤为重要。

“新基建”意欲何为？

既然新基建无法承担稳增长的重任，那各地争相布局新基建又有何用意？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大流行”，战疫进入下半场，国外悄然变成主战场，全球金融系统

也随之震荡，3月份内，美联储两次降息，并重启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让美国重回零利率时代，各国央行随之开启“放水竞赛”，市场却用脚投票，多国股市两周内3次熔断。此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此时，各地之前发布的投资计划无疑给市场一剂兴奋剂，且不论投资计划能否落地、达到预期，但从过往投资拉动经济的经验来看，此轮投资计划刺激政策本身就有提振市场信心的效应，在全球股市震荡下，新基建概念股的逆势走高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疫情赋予新基建的现实意义。

新基建的用意更多地指向未来发展与竞争。狭义新基建的本质就是一种技术，决定着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在国内，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各地都在寻求新的增长动能，用数字技术迭代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可行路径，新基建就成了产业转型升级中不可或缺的新力量。

国际上，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竞赛，各国纷纷开启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为未来的数字经济竞争做准备，而中国和美国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中国此时发力新基建，颇有要赢在未来的意味。此外，仔细分析各地发布的投资计划，发现省际投资差别较大，云南、福建、四川、河南、陕西5省的计划投资总额均在3万亿元以上，其中，云南高达5万亿元的规模。在财经评论员肖磊看来，这不是巧合，背后考量的是“关乎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地缘政治问题。”以云南为例，此次云南的基建项目中，涵盖玉磨铁路、大瑞铁路、沿边铁路、沿边高速、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等，基本上都为东盟和中国的跨境贸易做铺垫。随着云南补齐基建短板，未来中国跟缅甸、老挝、泰国等的贸易将实现有大规模增长，这也将成为制衡东边的越南，以及西边印度最有效的方式。

新基建专注未来，又凭借技术和互联网属性，给市场带来了无穷的想象空间，疫情之下，更是成为资本的新宠。但新基建要发挥作用需要长期投入，当下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资本热捧下，新基建如何避免沦为新一轮的资产泡沫？政府的强政策刺激如何确保不扰乱现有产业发展局面，不造成新的市场扭曲？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新基建投资的资金如何保障，能否引入市场化的融资方式？

毫无疑问，当下这些事情能否妥善处理，也将影响着新基建未来能否实现美好的宏愿。

(2020年7期 南风窗)

34 万亿“新基建” 带来了什么？

“新基建”火了，一出手就是 34 万亿。最近，北京、河北等 13 个省市相继公布的 2020 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投资额近 34 万亿元，而“新基建”成为了“吸金”主角。“新基建”到底指什么？又新在哪里？能为经济复苏带来什么？

“新基建”新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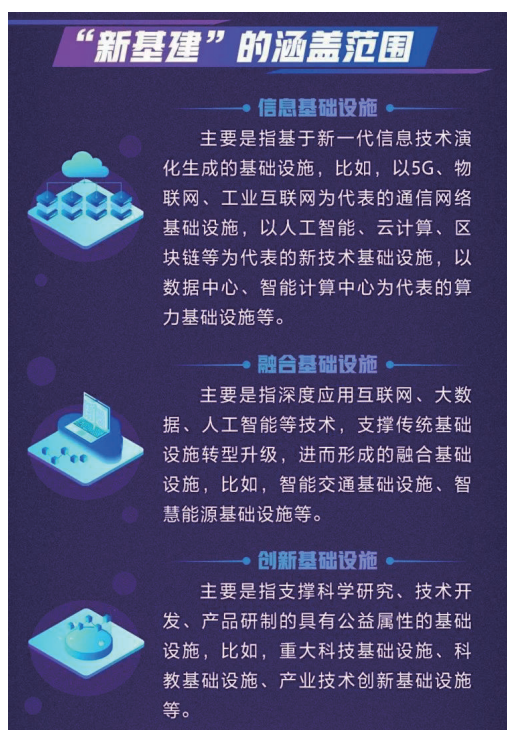
信息数字化是“新基建”最本质的特点。对于传统基建，大家都耳熟能详，俗称“铁公基”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但是“新基建”就不一样了，由于涉及大量前沿概念，普通人听起来就有点云山雾罩，其实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更加注重数字化、智能化等硬核科技。

“新基建”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 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对“新基建”有所提及。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是进入 2020 年，中央密集部署“新基建”，这一热词被频频点名。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这三方面，卫星互联网首次明确入围“新基建”。

34 万亿该怎么花？

近 34 万亿元的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一出，有人担心，这是否是 2008 年“四万亿”重来？34 万亿该怎么花？而 34 万亿看起来很多，但多数是未来几年的累计投资，不是一年的投资总规模。政府资金更多是一种“引导”，起到撬动作用。出于稳经济的考量，即便不得不适当加杠杆，态度也必然是审慎和克制的。土地财政降温，隐形债务严控，财政压力的加大和去杠杆的大环境更要求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在这种情况下，“新基建”的投入方式或许也将发生改变。



“新基建”钱从哪儿来？

发展“新基建”，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能走老路子，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既然瞄准了高科技、新兴产业，“新基建”作为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就不那么突出。这就意味着，“新基建”投资有较多的商业性。中国财科院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表示，政府应该加快市场体制、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34 万亿新基建的新机会

新冠病毒疫情还在全球扩展，中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也还在持续，但“疫”后如何复苏经济建设，一场更严酷的考验已经开始了。最近，中央多次会议提及“新基建”。一场规模超过 34 万亿，影响、覆盖更为宽泛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了。

据媒体报道，截至 3 月 1 日，包括北京、河北、山西、上海、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云南、四川、重庆、宁夏等 13 个省市区发布了 2020 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这份投资清单共包括 10326 个项目，其中 8 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 33.83 万亿元；另有 8 个省份公布了年度投资额，合计约 2.79 万亿元。

补短板的“新基建”正当时

此次疫情是对我国整体发展的一次考验，是考验就会有反应出一些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在最近的发布会上也表示，疫情暴露出我们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短板就是下一步投资增长潜力所在，

就是发展空间所在。



此次疫情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公共医疗的明显差距，美国 CDC 每年有超一百亿美元的预算费用，新加坡一个城市就有 800 家发热门诊（相比北京才不足 80 家）。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之前就已经建议过，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此次“新基建”值得期待的是，在多地公布的重大项目投资清单中，与疫情相关的项目投资紧急扩容。

让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也能加入到“新基建”的投资中。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说，对于“新基建”的投资，应该是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引下，采取“PPP”的政府和社会资金共投共建的模式。与传统基建相比，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PPP”和专项债，如果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将有可能撬动数万亿元民间资本投资。

危机前的新机遇？

不谋而合，全球目光都聚集到“新基建”的各项技术。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处于低增长态势。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新工业革命的“命门”，以期在未来发展中占据主动。再看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下一步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那么“新基建”

发力也顺理成章。从另一个角度看，新的机遇就在眼前。各类“云课程”、“云工作”之类的“云服务”一夜崛起，这背后也意味着对 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巨大需求。

当线上需求集中释放，“新基建”迎来发展窗口期。用上最快的网络，坐着无人驾驶汽车，享受着医疗上的人工智能服务等等，都离不开大数据、云计算的支持，那么“新基建”这个信息基础设施，正迎来发展的窗口期。一端连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新基建”有利于对冲疫情不利影响，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每一次危机面前，我们都有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希望“新基建”能给出新的方向和答案。

(2020-04-24 思客)

风口之下，要找到真正的机会

“新基建”，不仅仅是应对疫情的应急之策，更是过去政策的延续，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首次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指出要“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接下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都将为大家更专注的风口，但如何抓住风口产业的真正机会，才是“新基建”发挥作用的核心。

(1) 5G真正的精彩在于应用

5G会出现两个出现巨无霸的机会：第一个是应用支持层会出现巨无霸级的应用支持平台，不是现有的运营商，是未来的分行业、分专业的运营商。第二个机会可能是做服务支持、做业务支持的公司，只要你能抓住5G带来的技术特征，找到新的突破口，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大的支持，不管是to C的用户还是to B的用户，你都有可能实现你自己业务的突破。

(2) 人工智能是下一代互联网

人工智能会变得越来越基础设施化，各个行业都需要去看人工智能能否更快、更好地引入到自己的行业领域里面来。人工智能会成为互联网的下一代，就是因为它有广泛的适用性，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因为人工智能而获益。

(3) 物联网的应用集成商

物联网不是新的概念，这个趋势也喊了很多年，这个一定是未来，但关键要分析你的行业优势在哪，能否找到真实的需求，能否做出足够深入的行业方案。尽量避免成为一个简单的设备集成商，而要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要跨越这个阶段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蕴藏的新机会也是无限的。

(4) 智能制造的未来机会

机器换人的趋势仍将持续，但今天看起来很热闹，领域未必有市场，今天看起来暂时受挫、碰到问题的领域恰恰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工业机器人的机会在集成商，也就是需要集成商能够整合更多的科技含量和更好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站到产业的前沿去振臂高呼，告诉大家这才是方向。

生物医疗领域的富士康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生物医疗的短板，接下来一定会迎来更好的投资建设，但一定要看准方向。未来生物制药有个大的趋势叫“医疗器械化”，医疗器械化过程当中会诞生新的巨无霸。同时生物制药领域，也会诞生富士康模式，也就是说各家都做细胞治疗，需要有工厂代工模式，负责大规模地培

养细胞进行扩大，三星已经布局在做生物制药领域的富士康。

“新基建”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

这次“新基建”更着眼于“新”，有着更多科技内涵，既符合产业升级需要，也有利于原有优势的进一步升级。借助新基建，中国制造业会迎来新一轮产业优化，在不断强化我们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寻找、探索我们如何持续保持优势，应对下一轮全球化挑战才是更重要的挑战。

疫情对未来长远的影响，更值得重视，也蕴藏更多机遇。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天疫情有很多看得见的危机，但有一个不显著但可能对未来更为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如果不加强科技创新的投入，一批未来商业的苍天大树会提前倒下。今天很多中小科技公司，还没有盈利能力，处于研发阶段的他们还在靠投资生存。这些中小企业没有现金流，还在研发阶段，如果这批企业没能挺过疫情，将对我们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才是此次“新基建”应该更关注的领域。

以史为鉴，转危为机

世界历史上，每一次危机都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因为每一次危机背后都，都有着潜藏的、引领未来的机遇。40多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以钢铁、汽车、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顺势完成经济结构转型。

美国应对2008经济危机，和我们四万亿刺激政策不同，美国在政策、投资、市场加大了对信息产业扶持，才有了美国经济今天的增长。美国今天市值破万亿美元的四家公司，都是2008年经济后，重新抓住机会，创造巨大财富的结果。

过去几年每当经济出现不确定影响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拿出查理芒格的话，“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疫情之后，我们应该有所修正。没错，正在发生的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未来趋势对我们的影响。“活在未来”，才应该是我们经过疫情之后，更应该采取的方法论：以未来的视角审视今天的思维方式，以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决定今天的所作作为。

如果针对此次疫情，我们的“新基建”能够从全球创新生态的角度出发，借助危机重构我们对全球创新生态的战略布局，中国或许就有可能借助危机完成转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经过此次疫情这考验的中国制造业，就会更有机会为全球创新赋能，更好的参与到全球创新生态的建设中。 (2020-03-06 全球风口)

“新基建”助力抗疫情 稳增长正当其时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命题，这不仅为加快复工复产指明了方向，更提出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正步入智能时代，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是智能时代的必然要求。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三个工业化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兴起和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目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以人工智能发明和广泛使用的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设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要求。新型基础设施是智能化时代的标配，建设高水平新型基础设施，既关系到一国能否搭上智能化时代的快车，也关系到一国能否占居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过70年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下，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齐头并进，无疑会全面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稳定经济秩序、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特殊功能，一直在世界各国应对重大灾害和危机冲击的举措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是中国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外部危机影响的重要措施。尽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公路、铁路、物流、生态环保、农林水利、社会民生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有助于补短板、强弱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而加强5G、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别是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改

全球卫生治理 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全球化在不断推动贸易和旅行扩展的同时，也使传染病这种本来就不尊重国界的“劣品”快速地在国际社会传播，对全球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截至2020年3月底，2019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近4万人死亡和全球经济撕裂，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这充分说明，在卫生安全领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之中。事实上，“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跨国传染病威胁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一个单一的微生物海洋。”因此，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多边主义开展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卫生问题也日益超出医学范围，进入了全球发展和政治领域，从而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的蓬勃兴起。也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言，



“全球化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生物的全球化”。各种新发和复发传染病不但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也对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国际社会面临严重的卫生安全威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传染病如影相随，天花、鼠疫、疟疾、登革热……不一而足。以天花为例，第一次天花流行病发生

进医疗卫生、公共防疫、应急管理能力等，有力提升中国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水平。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多措并举，有序推进。一是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二是要采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三是充分发挥PPP等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

的积极性。四是加强经济政策的综合和协同调控功能，加快新基建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土地、环保、能耗等政策支持。五是用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经济体系运行的智能化水平，为新基建的发展创造和提供强大需求，拉动新基建更好更快发展。六是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凭借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为推动新基建快速发展，抗击疫情，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2020-3-13 光明日报)

于公元前 1350 年的埃及，后来在公元 49 年传到中国，700 年后传到欧洲，1520 年传到美洲，1789 年传到澳大利亚；源于亚洲的黑死病，在 1347—1353 年间造成了欧洲 1/3 的人死亡；在 1918—1919 年间，世界上几乎 1/3 的人感染了流感，其中有 1 亿人死亡。新冠肺炎、埃博拉、寨卡热以及甲型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频发，更是凸显了跨国传染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9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一场快速蔓延、高度致命的呼吸系统病原体大流行是非常真实的威胁，将会使 5000 万—8000 万人丧生，并将使 5% 的全球 GDP 灰飞烟灭。”仅仅在 2011—2018 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全球 172 个国家追踪到了 1483 个疫情暴发事件，其中包括埃博拉和“非典”。2009 年暴发的甲型流感，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就高达 12469 人。而 2019 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就已经在全球造成近 80 万人感染，近 4 万人死亡。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 2020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减半，并导致一些国家经济衰退。在跨国传染病的威胁之下，全球卫生治理就成了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

第二，卫生治理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全球发展议题。卫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卫生专家理查德·霍顿甚至建议专门成立“世界发展组织”，以促进全球卫生治理。联合国推动的全球发展议程充分体现了卫生议题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推动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2000 年 9 月，联合国推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其中的 8 个目标和指标将卫生议题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包括遏制艾滋病蔓延、降低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多项与全球卫生治理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内容。2015 年，联合国又提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此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拓展和延续。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还包括减少死亡率、生殖保健服务、传染病、抗生素耐药性、非传染性疾病、药物可获得性等具体方面的内容。2019 年 9 月，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健康全覆盖”高级别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健康全覆盖政治宣言》，更是将全球卫生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凸显了全球卫生治理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第三，全球卫生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重要议程。卫生议题本来是一个医学范畴，属于“低政治”领域。然而随着卫生决定因素的多样化以及卫生安全威胁的日益严重，卫生治理也逐渐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程。2000 年 1 月，联合国安理会史无前例地讨论了艾滋病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同年 7 月，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了有关艾滋病疫情的 1038 号决议，认为“如果得不到遏制，艾滋病可能会对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2011 年 9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了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高级别会议。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该宣言“承认非传染性疾病给全球带来的负担和威胁是 21 世纪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有损世界各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威胁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实现”。201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全球卫生和外交政策”的决议，明确了开展全球卫生外交在推动“全民健康覆盖”中的作用。2018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关于防治结核病问题的政治宣言》，从政治层面推动全球结核病防控。此外，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也通过领导人峰会宣言以及卫生部长会议等政治合作机制，将全球卫生议题提升为国际政治的优先议程，从而为全球卫生治理注入了政治推动力。

全球卫生治理的特点

随着全球卫生治理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之中。卫生危机所造成的区域和全球影响，使得全球卫生治理层次日趋多维化，而由于世界各国承担全球卫生治理成本的意愿和能力各不相同，全球卫生治理在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第一，全球卫生治理行为体多元化。当前的全球卫生治理已经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向了“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论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之中。就国家行为体而言，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导力量。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中国通过即时与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疫情防控措施以及临床诊疗方案等信息，成为全球疫情防控的最前线，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难得的时间窗口。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不仅保护中国人民，也在保护世界人民，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就非国家行为体而言，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的协调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专业技术权威和一国一票决策模式维护了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合法性领导地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权威、中立性优势和规范权力，发布相关防疫经验规范，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到疫情严重国家，指导和推动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世界银行也以其强大的融资能力，已经成为联合国系统全球卫生项目最大的资助方。2020 年 3 月 3 日，为了尽快帮助成员国采取有效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并尽量减轻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世界银行向受疫情影响的 60 多个国家提供了高达 120 亿

美元的支持。非政府组织以其信息获取和资金筹集优势，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为支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款1亿美元，用来支持病例发现、隔离和治疗，保护弱势群体以及加速研发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多国捐赠医疗物资，用于支持这些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总之，多元行为体的共同参与，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

第二，全球卫生治理层次多维化。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全球卫生行动相互补充，构成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多维图景。在国家层面，诸多国家纷纷推出全球卫生战略。例如，2008年9月，英国发布了题为《健康是全球的：英联邦政府2008—2013年战略》，通过协调政府各部门行动，来指导其全球卫生治理参与政策。2013年6月，德国政府发布了题为《塑造全球卫生：采取联合行动和拥抱责任》的全球卫生战略。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5月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成为美国全球传染病控制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上述国家层面全球卫生战略的提出，无疑会对全球卫生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在区域层面，世界各国也通过开展区域性卫生合作，促进卫生治理。例如，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在2013年10月22日共同通过了《跨界卫生威胁决议》法案。该法案旨在提升欧盟各国的应急准备体系，强化欧盟的突发卫生应急协调能力，并赋予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合法的协调应对权力。在东亚区域，截至2019年，东亚相关国家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和8届中日韩—东盟卫生部长会议，集中讨论了防控艾滋病、禽流感及新发传染病等问题。此外，中国还在澜沧江—湄公河区域，与域内国家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2020年2月20日，中国—东盟11国外长举行了关于共同抗击新冠肺炎问题的特别会议，并就中国—东盟携手应对疫情达成了重要共识。在非洲区域，非洲联盟在2015年成立了独立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公室的非洲疾病控制中心，以帮助所有非洲国家提升传染病监测、突发传染病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在全球层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多边合作平台。此外，一些国家通过政策协调，依托集体力量在全球卫生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例如，2007年3月20日，巴西、法国、印尼、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等7国外交部长在奥斯陆共同发表了《奥斯陆部长宣言》，发起了“对外政策和全球卫生行动”，旨在通过外交协调来推动全球卫生治理。

第三，全球卫生治理形式多样化。毋庸置疑，当今全球治理的主角依然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国际机制。就全球卫生治理形式而言，其中的国际机制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或倡议性的）治理机制。正式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所做出的决定对成员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一条规定，成员国有法定义务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任何对人类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疾患或病症，不论其病原或病源如何”。再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规定，允许各成员方为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取必要措施，只要这种措施的实施在各成员方之间不构成任意或无端的歧视手段，或者不会形成伪装起来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就是说，在全球疫情防控中，任何国家不得以卫生安全为由而采用歧视性的贸易政策。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利用其灵活性，也在全球卫生治理议程设置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倡议性的国际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通过领导人峰会或卫生部长级会议所发布的有关全球卫生的共同宣言，提高卫生议题在全球发展和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塑造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时，二十国集团在3月26日召开了领导人特别峰会，为全球合力抗疫和稳定世界经济提振了信心和指明了方向。

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

国际社会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已经取得诸多成就。例如，为了增强最不发达国家药品的可及性，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专门规定了“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灵活性条款。世界卫生组织也利用其“软法”——《国际卫生条例（2005）》，通过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平衡卫生安全保护和全球贸易促进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全球卫生治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所谓卫生问题政治化，就是以卫生议题为手段来追求政治目标，将卫生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全球卫生安全，而将卫生议题政治化来追求一国的政治目标，无疑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不利于全球卫生合作的开展。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个别国家将卫生问题政治化，恶化了全球卫生治理所需要的国际合作政治基础。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国国内不利于全球疫情防控合作的声音粉墨登场，乱贴污名化标签，使用“甩锅”伎俩，制造妨碍中美两国合作抗“疫”的“病毒”。个别政客为了捞取

政治资本，毫无底线地利用疫情来攻击中国。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汤姆·科顿无端指控此次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武器计划项目；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抱着零和思维，认为新冠病毒在中国的传播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为美国带来可能的经济机会；特朗普政府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美国要从中国“召回”四家口罩生产商，他甚至还要求“所有美国的医药公司全部撤离中国”。二是个别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引入政治议题，导致世界卫生组织超出管辖范围而引起该机制功能紊乱和制度超载。例如，美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在调查可疑生物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美国压力下，世界卫生组织就向有关成员国通报事项做出了非常模糊化的规定：“如果缔约国有证据表明在其领土内存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外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不论其起源或来源如何，即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所有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到敏感的、由生物安全事故或生物恐怖主义而引发的卫生安全问题，那么有可能会削弱其最初的公共卫生使命。

第二，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碎片化。随着全球卫生决定因素的多样化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行为体数量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导致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整体性协调机制缺位，进而造成全球卫生治理效果不佳。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控为例，尽管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强调不建议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以及分享疫情防控的相关经验措施，在全球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诸多国家还是各自为战，鲜见全球统一行动。这充分说明，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依然处于碎片化状态。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由于存在“制度惰性”，在自身治理结构改革方面跟不上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形势，结果导致影响力日益下降。

相比之下，世界银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却日渐增长。例如，世界银行将传染病控制列为其重点关注的五种全球公共产品之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银行宣布划拨120亿美元，帮助成员国应对并减轻疫情的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世界银行正在成为全球卫生治理中最重要的国际机制。”非政府组织也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14年西部非洲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中，国际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战斗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第一线，而世界卫生组织却因反应迟钝而饱受批评。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

联盟以及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等全球公私伙伴关系也成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贡献者。上述具有不同利益偏好和具体卫生治理项目的行为体固然在各自具体的领域促进了卫生治理，但是由于缺乏整体性的协调机制，也导致全球卫生治理政策相互折冲、交叉重叠以及全球卫生资源的浪费，从而不利于卫生治理的整体推进。

第三，全球多边卫生治理机制双边化。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多边主义，然而当今的全球卫生治理却呈现出双边化的趋势。作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界卫生组织却因为严重依赖自愿捐款，在项目推动方面呈现出双边化的倾向。也就是说，个别大国通过多边机制来追求其双边外交目标。自1999年起，“零增长原则”被引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制定过程中。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来自成员国缴纳的评定会费一直没有增加，由此带来的财政危机也一直制约着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的发挥。其结果便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融资方面越来越依赖成员国的自愿捐款。与评定会费相比，自愿捐款资助的项目预算比例却大幅度上升。例如，在2018—2019年财政预算中，自愿捐款的项目预算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预算中占比达78%。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严重依赖的自愿捐款，大部分都被捐助国指定了具体用途。正如有学者所言，“自愿捐款不利于多边治理，会将国际组织的权威分散到捐助国手中。”同样，这种由捐助国来指定用途的融资机制，也明显将属于多边机构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从世界卫生组织转移到单个的捐助国手中，所产生的治理进程显而易见具有双边性质。也就是说，自愿捐款到底用于哪些全球卫生治理优先事项，都是受捐助国的政治和利益偏好所驱动，而非世界卫生组织所确定，结果不但侵蚀了世界卫生组织在预算规划方面的权威，而且也弱化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权，扭曲了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先事项。个别国家甚至赤裸裸地以自愿捐款为工具，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多边机制中追求其狭隘的政策目标。例如，2018年6月，当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要通过厄瓜多尔政府提出的关于鼓励母乳喂养的决议时，特朗普政府就威胁称，如果其他国家推动该决议通过，那么美国将会削减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捐款。

传染病防治问题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参数，这预示着全球卫生治理任重而道远。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提示，不管全球经济到了何等发展程度，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传染病防治面前掉以轻心。尽管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体在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层面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之中，但是全球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

在抗击新冠肺炎中，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增长潜力。而在疫情之后，新一代数字相关技术将如何继续为数字产业赋能加力，提供更多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这些都将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热点。4月11日，新华网“思客云讲堂”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干部教育中心联合推出第三讲“2020 公益年直播课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对“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进行展望。

我们看数字经济有两条线，一个是长期趋势，一个是近期赋能。长期的趋势我们讲以下四点，第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二是新技术会提供发展新的支撑。第三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提出的要求。第四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的要求，这是长期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向好的趋势。

近期赋能我们也讲四点，第一是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间表现非常优异。第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第三是我们可以启动新的服务需求。第四是在这次防疫中，我们企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展现，被更多公众所了解。

我们按照这样两条线，今天跟大家介绍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第二，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的防治中确实是大展身手。第三，

新的技术会拓展新的空间。第四，要启动更多的服务消费。第五，产业互联网会加快发展。第六，我们中央要求的服务业、制造业要融合发展。第七，今后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要各归其位，发挥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



新机遇，数字技术表现亮眼

先看第一个方面，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9次的学习，其中4次都是直接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的。一次是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还有一次是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再有一次是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最近的一次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最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加快5G的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

卫生治理依然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在传染病语境下，世界各国“因病相依”，因此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更需要全球多边主义，而非一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唯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维护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地位，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

各国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所强调，“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2020年4期 当代世界）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

第二，我们讲讲数字技术在防疫、抗疫中的突出表现，简单概括一下，也是两条线。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在疫情中的社会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防控中在患者的诊疗、疫情、地图、人群追踪和分类管理四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生活方面，在在线教育、餐饮外卖、协同办公和零售电商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看一下，患者诊疗方面，有几个在疫情中间才比较成规模应用的新的方面。一个是智能医疗机器人在医院中的应用，它可以传送很多的物品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第二是智能化的医疗影像分析技术，提高了速度和诊断的准确率，阿里、腾讯、华为这些大的科技平台企业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第三是远程医疗，它为专家的远程会诊创造了条件，解决了我们疫区专家资源不均匀和安全性的问题。第二方面是疫情地图，可视化地显示疫情，全球实时动态确诊。现在很多城市，你点开以后知道今天新确诊的病例在哪里，去过哪里，追踪还是非常详细的，也是非常有用的。第三方面是人群追踪，你乘坐过哪趟交通工具，这趟工具上是不是有过确诊和疑似的病例。自己录入进去就可以查询。另外可以分类管理，比较典型的就健康码。这是我们数字技术在助力疫情防控中间发挥的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它在数字技术保障、社会运转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在线教育，这次推迟开学，大中小学都在开始进行远程授课，特别钉钉对中小学的教育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支持了各种创新的在线教育模式。外卖不用讲了，这次为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技术保障社会的运转一个方面还是零售电商，确实是推动了无接触购物和配送。相信我们在线的每一位同事，在疫情中一定对保障日常生活运转的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有深刻的印象。再一个就是远程协同办公。复工以后，科技企业提供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降低了人群集聚的风险，腾讯会议的用户是成倍地增长。

数字企业还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不光大家熟悉的这些外卖、会议、教学等等，清明节刚刚过去，美团和中国景区协会联合会共同发布了一个防疫标准，符合标准的景区，在它的页面上就会注册叫安心玩景区。清明节期间，安心玩景区收获的客流量，是非安心玩景区客流量的2.1倍。另外它和饭店协会联合推出了防疫标准，注明了安心住的酒店，也是在清明节期间，安心住酒店的间夜量环比，是非安心住酒店的1.6倍。这都是这些

大的数字技术企业，根据当前防疫、复工正常生活的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发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除了保证国内民众正常的生活工作之外，这些企业还向全球展示了数字企业的优秀和责任感。比如钉钉被联合国推荐给全球的学生和老师进行远程学习。这是刚才讲的第二个方面，在防疫抗疫中数字技术的优异的表现。

第三讲一下新技术拓展了新空间，其实就讲到5G的应用到底如何来拓展下一步的数字产业、数字生活。在疫情之前，最近两年多，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减利的趋势，总体上还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和增长势能有所减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从市场来讲，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上网时长是出现了停滞，这两个数字大概在最近两年多增长出现了明显减缓，在最近一年多有停滞的趋势这是市场的问题。第二，从供给侧看，互联网新产品的表现总体上是比较贫乏。第三，国内外多数互联网企业业绩平平。出现这种数字经济发展减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4G技术支持之下，互联网能够支持的产品，需求已经比较饱和，新一轮发展需要新的技术来支撑。

我们刚才讲新产品的出现，消费互联网是上半场，产业互联网是下半场。巨头们希望进入下半场，但还没见到那种热闹场面，原因还是目前技术支撑不够。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新基建。新基建的概念，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之后，集中在这几个方面：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最近又加上了数据中心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说，2020-2025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中国10.6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产出，能够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我相信我们有好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是应用5G，我们有应用5G的较强的能力，有巨量的消费者和大规模的产业基础。中国的巨量消费者能支撑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我们的产品迭代是非常迅速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很大规模的实体产业，能够支持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平台，也能连接非常多的产业、企业和设备。再往后我们有大数据，有机器学习。机器学习需要什么？它需要巨量的数据不断地输入。我们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可以录入的供机器学习的数据，应该都是全球最大的，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还相信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有一批好企业，企业是真正数字时代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它不光有能力，还有价值观。我们在这一次危机中，由于对网络空间的需求升级非常快，这些企业几乎天天在更新版本，

天天在加速工作，既展示了能力也展示了它们的价值观。

还有一个企业向全球展示了我们数字企业的优秀度和责任感。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搭建了一个国际医生交流中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实时交流最新的疫情防控临床经验，而且他们用数字化的方式，支持十一种语言。各国的医务工作者既可以选择和中国医生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选择参加医院分享直播课堂，这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赞誉。马云跟我说的时，我还很不像话地问了一句，你这收费吗？马云说我这是救命，我收什么费，在这个时候全球是一个共同体。我相信我们这些企业，有这种胸怀和情怀，将来的发展是是很有前景的。

新挑战，发展空间仍需拓展

数字经济是有两种形态的，一个是5G产业化，5G的手机、5G的基站和5G应用中的一些发展，另外还有一类应用是产业加5G。在5G的加持下，我们可以启动更多的数字消费。大量新机遇出现。首先是技术发展支持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双轮驱动，很多百亿级、千亿级的消费是可望实现商业化。第二是疫情培养了消费者的新消费习惯。网络学习、网络会议、网络医疗、网络办公等等，大家都已经非常适应了。各个层面对新应用形态接受程度更高，想象力更酷，想象空间更大。数字服务有大量的新机遇。

在新一代通信技术之下，产业互联网的前景是很广阔的。产业互联网需要的通信量和计算量，和我们消费互联网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淘宝、天猫、京东，它有一个数字化平台，对所有的企业、对所有的消费者、对C端都是可用的。但是对产业互联网来讲，这个平台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纺织企业可以用的数字化产业互联网，可以用到汽车企业上，可以用到其它类型的产业上。

下面我们讲一讲5G之后或者新一代通信技术之后，我们有一个促进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的痛点。实际上现代经济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我们现在经常讲服务型制造商和制造型服务商，其实它一定是融合的企业。数字技术的发展能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服务，它能促进制造业更高效的发展和快速迭代，能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我还是举个例子，这是一个企业叫猪八戒网，他给生产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生产性服务，你开办的时候需要做什么？需要创建，需要注册、需要取名、需要品牌设计、需要文案、需要向社会推介。你在企业生产的时候，你需要钱、需要专利、需要商标、需要版权、

要交税。企业运转，需要IT系统，需要很多的东西，你的特色服务，可能需要装修，你开国际会议需要翻译。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的话，自己做这么多的服务，一定水平很低，效率也很差。因为你雇不起那么高的专业的人。所以他可以用专业化的人来提供给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这个企业在重庆，我是重庆的人大代表，所以我很为这个企业骄傲，在这个地方能产生出来全球最大的一个平台化生产性服务企业。它有多大规模呢？总注册数是2200万。共享的人才数，即服务商有1000多万，雇主企业数1000多万，开店的服务商有120余万家，已经有10万多家个人在平台上，由于各种生产性服务到位，被孵化成公司了。它的业务量，为1000多万个买方、雇主方提供了服务，能提供1000多种生产性服务，给300多万户企业设计了品牌，给100多万户企业设计了logo，180多万次提供了营销服务。给企业做IT系统有80多万次，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有120多万次。

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规模的实体经济的话。这样专业化的服务平台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它的客户群是我们13亿人，我们这样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面对的是我们的整个制造业、整个的农业、整个实体经济。一定要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存在、企业存在，这种企业的生产性平台才能够做到这么大。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叫做大型平台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这是一类专业化的服务。

我们还有一类企业就很有意思了，比如杭州有一个企业。它是做印刷线路板，给印刷线路板打样，打样环节在企业来讲可能要打几次、十几次，实际上就是做一个样品看一看，一个企业打样是很分散、很零散的，单价也不高，但是量很大，时效要求又很高，是一个研发级的设计级的订单。这个企业就只做这一件事，可以想象它的专业化程度有多高。它把过去需要五天才能完成的样品生产时间缩短到了24个小时。

还有一个企业在宁波叫生意帮，是一个社会化组织生产的企业。它是干什么呢？利用它在宁波在江苏产业集群特别密集的特点，就是中小企业非常多的产业群，小企业的特点就是生产不均匀，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每个企业中间会有一些闲置设备，它就利用这样一个背景来做一种业务，就是我接单，接完单以后，就询问区域内的这些小企业，谁有我需要的空闲设备？把这些设备组织起来，它有空闲以后就现场组织，我们叫云端工厂，然后来生产一个专门的产品，生产完以后云工厂现场解散，接了新单需要什么设备怎么匹配再新组织一个，这

企业是非常有意思的。

后面两个案例，一个是印刷线路板的，一个是生意帮，这两个案例特别有经济学的价值。美国的经济学者科斯教授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他说为什么要有企业？机器设备我们社会化的来组织生产不是更好吗？企业一旦组织起来，可能接不到单以后，设备就会被闲置。而且在企业里边有可能专业化程度不够高，不能够专门针对一种非常细的产品来生产，不能有足够的生产弹性。生产量大了就把它变成一个大企业，生产量小了就变成一个小企业是不可能的，弹性也不够。为什么要有企业呢？科斯就提出了一个交易成本，他说社会化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太高，我要搜索哪有现成的设备，我要知道这个企业的信誉高不高？上一单做的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可信的企业？我怎么匹配那么多的设备在一起，同时来完成一个生产过程？他说社会化组织资源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我们要企业。

我们现在回来问一下，数字经济时代，搜索成本、信任成本、匹配成本都大大降低之后，也许企业的组织形态会发生大面积的变化。

新需求，产业治理各归其位

最后一点就是市场和政府要各归其位，这也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无论新经济也罢，数字经济也罢。我们觉得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们一个基本观点。第一是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性。那种创新和迭代的速度，那种脑洞大开的想象力，很难事先做出一种规划和计划，一定要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我们非常相信从市场中拼杀出来的企业，有很好的综合能力和眼光。第三，这些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一定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在企业很强大的情况下，政府做什么？政府怎么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个时候的市场不足和我们以前讲的，在数字经济时代之前的市场不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全球最好的数字企业，市场中拼杀出来的企业，他们的能力一定是很强的。我们刚才讲的企业为主导，市场为主导，他们能够做我们下一代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事情的时候，政府干什么？政府一定要理解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治理的需求。我们点一点题，数字时代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了主导产业的核心增长点。治理要干什么呢？一定要关心能够展示数字企业发展的一些统计数字，要加大对新经济指标的统计和使用。第二，万物互联时代，一定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时代。

不要争制造业优先还是服务业优先。其实制造业和服务业，一定是融合发展的。我们那么多的大企业，他们投资做新一代数字技术研发的能力不比我们这些大院大所差，特别在应用层面上。但他们做出来以后，落地落不了。它需要和教育系统连接，它需要和医疗系统连接，它需要和政府治理和城市治理连接，应用场景的落地权力在政府手上。所以这个时候技术开发政策可以交给企业，政府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要在合理管控下，把这些应用场景能提供给市场和企业，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另外产业的优势来自于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存。不能说企业大就一定有问题，但也不能说大企业就不管了。当企业大没有监管的时候，企业作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两者中间找好平衡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很多的公共产品，政府的公共机构就应该提供或者购买这些产品来为市场服务。举一个例子，比如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要万物互联，必须要给每一个入网物品命名，这样才有可能全网来通用。所以它需要一个身份证。现在产业互联网有一个基础建设，叫标识解析体系。可以想象我们产业互联网要连接的东西有多少？这个从企业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公共产品，政府多做点这样的事情。除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之外，数字技术的治理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对人的面部识别，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作用。它有很多好的作用，比如寻找走失的儿童，无人机抓拍违章。但面部识别技术也可以被不当使用，比如微型武器，可以通过面部识别技术精准攻击。技术的应用有好的，也可能有不好的，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好的治理措施，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总的来讲，疫情期间，我们对很多技术的使用，有正向的作用。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就是数字经济新一轮发力面临多方面的重要机遇。第二，我们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我们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又展示了它的数字技术的能力。第三，数字经济对疫后的复苏、就业、消费迭代、产业升级，我们服务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是基础性的力量，政府和企业要各归其位，所谓其位是数字时代各自的位置，产生合力，促使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2020-4-11 清华大学2020公益年直播课堂）

中日文学交往中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

数月来，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诗句所感动。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应知扶桑东，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这些雅致的汉诗，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



唐诗中的休戚与共

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关怀，与中国文学传统深有关联。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极为丰富。“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出自《诗经》，“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郎》。中国诗歌中，类似的还有“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天台立本无情隔，一树花开两地芳”等诗句，都表达了休戚与共的关怀与支持。

中日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时代莫过于唐朝。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唐代是诗歌盛世，诗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养。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奈良时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便是仿照长安所建，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公卿贵族、高级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尚。在江户时代（1603—1868）以前，日本的汉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汉文书写与社会地位之间有强烈关联。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日本长屋王。《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希望中国高僧能够去日本传授佛法。《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记载：“鉴真受其衣，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鉴真

从743年开始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在753年抵达日本，引起轰动。他双目失明，却仍在日本弘扬佛教及中国文化十年，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被尊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鉴真圆寂后，日本人纷纷写诗悼念。石上宅嗣在《五言同伤大和上》中悲叹：“招提禅草歇，戒院觉花空。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鉴真圆寂后，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谢了，人世间的生死虽可恨，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怀念鉴真：“我是无明客，长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言鉴真虽然双目失明，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本来“无明”之人获得了“光明”，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从而深受教益。藤原刷雄的《五言伤大和上》中有“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两句，是对鉴真不辞千里来到日本弘法，留下万世馨香的赞美。如今，唐招提寺中依然种植着鉴真故乡扬州的琼花，这也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另一种表达了。

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诗人也多有诗歌唱酬。阿倍仲麻吕（698—770）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716年，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改名晁衡。他爱慕中国之风，在大唐进士及第。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授与左补阙等要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终老于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有交往，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751年，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许。临别前，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中有“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两句，可谓推心置腹之语。字面意为：故乡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晁衡在长安多年，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乡。若不是“且认他乡作故乡”，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王维知其心意，所以用“乡树扶桑外”来安慰他：如果思念中国，看看日本的树木，不也和中国一样吗？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满了留恋，作诗《衔命还国作》，其中“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两句便与王维的“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相呼应。“蓬莱”是中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代指日本。“扶桑”与“若木”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东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国在日本的西边，“若木故园林”便有以长安为故乡之意，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留恋。

李白与晁衡也是朋友。晁衡赠衣于李白，太白有诗曰“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兴奋之情溢于言表。753年，长安误传晁衡在海上遇难，李白为此痛哭，作诗《哭晁衡》。其中“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两句尤为情真意切。在李白心中，晁衡是一轮明月，他的离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自己是一片云，愁云满面，

悲痛万分。好在这只是误传，晁衡平安归国后读到李白之诗，也是百感交集，作诗《望乡》。在日本写“望乡”，便寄托了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怀念。诗中“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两句，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邻如亲的关系，以及自己对中国的拳拳真情表露无遗。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无论是在日本文人对中国鉴真和尚的怀念感恩之中，还是中国文人对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谊之中，汉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真与晁衡这两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也因中日诗歌交往更添光辉。

日本小说中的汉诗传统

日本文学的汉诗传统源远流长。除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外，日本文学中还有“自言四海皆兄弟，不愁乡国隔山川”、“更怜去故乡，蹈海求良匹”等许多表达类似关怀的汉诗。正是因为这些汉诗的出现，让经历了白话文运动而对文言渐渐疏远的国人感到讶异。其实，比起白话汉语，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日本汉学学者学习中国的语言典籍，通常以《昭明文选》《白氏长庆集》《论语》《孟子》《庄子》等诗文集作为教材。很多日本著名汉学家能用文言文撰写高水准的汉诗文，却不能开口说日常的汉语口语。对于更多没有学过汉语的日本人而言，汉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了一种深植于心的中国情结和文化符号。尽管后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却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历史上朝代众多，每个时代统治者的立场不同，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在两国关系紧张还是平和的时期，或隐或显的中国文学都是日本文学趣味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构成了日本中国形象的内核。日本文人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学精华，日本汉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汉诗文素养就是中国情趣、中国情结最为突出的表现。

江户时代以后，汉文教育开始普及，汉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与平民化的趋势，也出现了一批汉文小说作者。日本文人喜欢在小说中模仿中国小说插诗、引用中国诗歌或自作汉诗。例如，小说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汉文小说《本朝小说》中引用了几十首中国诗歌。小说本身表现的汉文水平本不高，但引用中国诗歌时却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抄录，想要借小说创作展现他所认为的“汉诗精华”。再如，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之

奇遇》（柴四郎原作，梁启超将其译为《佳人奇遇》）虽为日文小说，中间也经常插入诗歌，选用了大量的《诗经》《文选》诗赋。柴四郎自创的汉诗水平也很高，如“月横大空千里明，风摇金波远有声。夜苍苍望兮茫茫，船头何堪今夜情”，这样典丽的汉诗在明治文人间广为传颂，德富芦花就常在月夜下独自朗诵。

日本小说中常常描述文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以汉诗唱和的情节，表现出很高的汉诗素养。例如，在三木贞一的小说《情天比翼缘》中，男主角柳翠郎与友人在东京游览名胜时互作汉诗酬唱。翠郎作诗曰“喜尔呼京洛，应知京洛争”，雪江先生作诗曰“官樱比古翻添色，都鸟于今始副名”，庐州先生作诗曰“三月东都丽景新，胜情偏属此江滨”。形式虽为汉诗，描绘的却是东京的春日风景：河畔樱花盛开，鸟雀啾鸣。“京洛”并非实指中国的长安与洛阳，却让人不由联想到中国文学传统，为这片东瀛胜景吹来了中国之风。

汉诗不仅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间的风雅同好，也是向异性表露心迹，乃至推动爱情进展的关键。小说《佳人奇遇》中，当日本志士东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时，他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心迹：“有美人兮，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出自《诗经·野有蔓草》，原文为“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虽然与原文略有出入，但也说明作者柴四郎的汉学素养很高，能够背诵《诗经》中的诗句。佳人听言，“以柳枝掩半面微笑”，芳心暗许。三木贞一的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也将汉诗用得极为纯熟。小说以一首自创的七言律诗开篇，首联为“东都第一冠繁华，名妓家邻才子家”，以南宋杭州比拟东京繁华。小说中写到男女主人公分别的时候，作者引用王昌龄的《闺怨》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小说虽然发生在日本，但男女主人公都精通中国诗词，熟知中国文学典故。男主角梅雪操与情人小红告别，担心下次相逢时她已是“绿叶成阴子满枝”（语出杜牧《怅诗》），小红答道：“文君未白头早做吟，婕妤好先秋风已题扇。”这里化用了两个中国典故，卓文君作《白头吟》表达“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坚持，班婕妤作《团扇诗》，吟咏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遗忘。短短14个字，却表达了双重含义：自己内心的坚贞，以及对情人的担忧。三木贞一在《情天比翼缘》中更是用上了藏头诗。男主角柳翠郎捡到了女主角莲香玉的金钗，翠郎还金钗时附上藏头诗一首，藏的四字是“独思美人”。香玉一读就知道是藏头诗，回信时也作了一首藏头诗，藏字为“非复无情”。像这样以汉诗推动日本小说情节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小说中插诗是中国明清小说常见的表现手法。中国戏曲以及章回小说中，往往有上场诗、下场诗、定场诗、中场诗等，人物对白，情节推进中都喜欢插入诗歌。日本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中日小说的“风月同天”。

中日文学中的“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在于它描绘了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真情。中日两国都是饱经患难的国家，共享着汉文化、儒家文明的遗产。文化相似则人心相通，在中日文学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少见。

不少日本文学作品描绘了善良、正直、勇敢的中国人形象，中日两国人民相互扶持，并肩而行，共渡难关。冈鸣冠山（1674—1729）的汉文小说《德容行善有报》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扬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为众人所敬仰。因为听说日本长崎风景秀丽，于是从事中日商贸，侨居于长崎。有一位日本美人丰娘愿意“典身为妾，以救父母之困”，李德容来到美人家中，发现“家空如洗”，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母亲已经卧病多月，丰娘“自欲以身换药，救其危急”。李德容见状心生怜悯，以礼相待。虽然丰娘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李德容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但他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与丰娘结为义兄妹，“顾如同胞”，当夜就送去三百两银子，此后还常常赠送钱米。过了数月，李德容又亲自主婚，把丰娘嫁给了一位富家公子，并为其准备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柜箱首饰、粗细家伙、桶锅碗碟。这一事迹被长崎人传为佳谈，时人有诗赞曰：“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丰娘嫁富人。适见朱陈两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获利颇丰。回国时，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飓风，但因其善举得到了妈祖保佑，保全了性命。

《德容行善有报》的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是武士的时代，仅占总人口数10%的武士阶层居于统治地位，掌握着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五次颁布锁国令，打击基督教，也打击了日本与外国的商贸往来。锁国政策下，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才能在长崎贸易，也使得中国文学得以流入日本。中国商船几乎是日本民众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中国文学也丰富了日本读者的精神世界。从《德容行善有报》来看，当时中日商贸畅通，人心相近，语言无碍。在日本的中国人行侠仗义，最终善有善报，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从长崎人的评价可知，像李德容这样侠义而充满美德的中国人在江户时期并不是个例，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也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观。

19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相继遭到来自西方强国的挑战，经历过相似的近代化道路，也怀有对东方儒学文化传统的共同“乡愁”。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的急先锋福泽谕吉曾表达过这种看法：“日本人本来就是由儒教主义培养而成，……王政维新以后的革命是震天动地的大变动，……因此也就如同夺其精神而无遑他顾，为文明进步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随其后，但同时心灵深处都尚存有古老主义的余烬，无不窃窃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这不仅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共同感受，也是晚清中国人的共同感受。在儒学传统与以西欧为标准的现代化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如何取舍，成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临的共同考验。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现代性中的挣扎，集中表现为在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挣扎。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脱亚入欧？

柴四郎的小说《佳人之奇遇》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途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忠孝节义、卓识奇智的中国志士范卿，他与日本志士东海散士、西班牙女杰幽兰、爱尔兰女杰红莲一起，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并肩奋斗，“以弱国之儿女共谋民族复兴之将来”。他们都是他乡流离之客，共同伤感于国运家恨、民族屈辱的历史，引为知音。范卿与东海散士志同道合，慷慨谈论时事，“誓他日戮力同心，共为兴亚之举”。他们都为中国经年来受到的“挫辱”而感到悲哀，希望能够禁绝鸦片，振起国民精神。范卿对东海散士说：“是仆之素志也，不期胸中积蕴，与君相合。噫！世岂无卧龙凤雏哉？”把自己与散士比作三国时期齐名的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分离数年，生死未卜，散士怀念范卿，作诗曰：“楼船破浪叱鲸鲸，鹏翼抟空空有声。落落雄心与谁语？白云山下忆范卿。”短短四句汉诗，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对范卿的牵挂不舍寄托其中。《佳人之奇遇》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近代，两国民间跨越国籍、种族的友谊依然不绝如缕。范卿与东海散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异国知己，不仅源于他们共同的志向、中日两国在近代面临的共同危机，也源于他们共享的汉文化。他们互相尊重、支持，保持着友善的双向交流，也成为了中日文学交往中令人感动的一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并不是日本文人单方面的感受，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相似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文人来到日本，渴望从日本的现代化中汲取经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表达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1907年赴日的刘师培写下了《日本道中望富士山》：朱明返羲轡，昔慕匡庐崇。讶兹高寒区，移樽木东。厖薄衍峻壤，崛崎培峒峰。冰液凝夏条，雪尘浣春丛。吐曜遑龙辮，委羽僊禽翀。冈冢草罢绿，岷渌樱燃红。侧观拭游目，遐览愉旅衷。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逋士有坏丘，仙俦无遗踪。空闻珠玕林，奇光开瀕蒙。

刘师培的诗歌基调通常沉郁伤感，这首诗却表现出罕见的轻快。他告别故国，远离党争纷扰，对日本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他笔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冰清玉洁，遗世独立。“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两句把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传说联系起来，表现出对日本民族的亲近感。虽写富士山，几乎通篇是中国意象，把富士山与中国的庐山、道家仙山委羽山联系起来，并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阂。“昔慕匡庐崇”一句表面是在写庐山，实则借以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向往。白雪与盛开的樱花交相映衬，这在初到日本的刘师培眼中显得极为新奇。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发现徐福东渡的遗迹，可惜了无踪影。他离开中国来到日本，表面上看起来是背井离乡；加上语言不通，更应该有异国之感。可是从这首诗中看来却并非如此，他期待摆脱满清的统治，来到一方深受汉文化浸濡的土地上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相较于满清，日本对于刘师培而言反而更有亲近感。这也是一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意表达了。

诗歌之外，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也描绘了一位正直、友善的日本老师。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藤野先生能够力排众议，对当时的弱国子民鲁迅分外体贴照顾，这也是一种同舟共济、风月同天的关怀。

他乡是一面镜子，一切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确立的。一种文化对于另外一种文化，通常有三种态度：一种视异文化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心态，但这种认识通常属于幻象。一种把异文化视为低下负面的文化，对其有一种憎恶之情，从而反衬出本土文化的高大。第三种态度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认可，将异文化与本土文化都视为正面的、平等的存在，两种文化的对话表现出一种友善的态度。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是一种持续性对话。中日文学交往中，不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善意的双向交流；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情谊也在这些真挚持久的汉文学中历久弥新。

(2020-4-10 文汇报)